



岸堤干校：山东革命干部的摇篮

□ 张艳芳 魏振华

红色记忆

岸堤是山东沂蒙山区一个较大的村镇。它坐落在群山之中，四周峰峦起伏、峡谷纵横，由于自古交通不便，是个相对闭塞的地区，1938年8月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入驻使它声名大振。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长时间驻扎在岸堤，因此又被称为岸堤干校，它在一年多时间里培养出3000多名军政干部，成为山东革命干部的摇篮。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于1937年10月初从德县入侵山东，并一路南下。国民党军队稍战即逃。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组织毅然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重任，在全省发动了十次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建立起数十支人民抗日武装，抗日烽火燃遍齐鲁大地。但是，这些部队的兵员大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战斗经验不足、政治素质不高。要想进一步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沉重打击敌人，提高抗日军民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1938年5月，郭洪涛受党中央委派来到山东，任山东省委书记。5月下旬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边区省委书记。此时，随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日益扩大，干部缺乏问题更加突出。在郭洪涛提议下，边区省委决定成立一所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1938年6月，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创建，边区省委宣传部部长孙陶林兼任校长。干校没有固定的校址，建立后一直随省委机关行动，从新泰南鲍庄到蒙阴大庄、肖家峪，再到费县仲村、滕县善固村。由于遭到滕、峰一带地主豪绅的联合围攻，边区省委决定挥师北上，回鲁中区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干校随边区省委机关到达岸堤，从第二期培训班开始，一直驻扎此地。

干校第一期学员200余人，毕业后奔赴全省抗日战场。在他们的影响下，第二期招生简章一经下发，苏鲁豫皖边区的进步青年、小知识分子、青年农民闻讯莫不欢欣鼓舞，想方设法前往求学。第二期原本计划招收400人，结果招收600余人。学员来自苏鲁豫皖边区各地，有八路军游击队、地方政府、群众团体的干部战士，也有城市工人、流亡学生、农民、商人、店员，有40多岁的中年，也有十四五岁的少年。

干校设有大队、中队和分队。在



位于岸堤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旧址

一、二期时，设立军事、政治、民运3个中队，讲授内容主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游击战术等等。没有专职教员，一般由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授课。后来又陆续增设了青年队、妇女队、地方武装队、教育队和财经队等。课程设置增加了马列主义课程，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也逐步增加了专职教师。

艰苦的学习生活

干校诞生于动荡的战争环境中，办学条件非常简陋。刚成立时，干校随边区省委到处转移流动，学习生活环境非常恶劣。由于经费给养没有着落，学员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虽有一台油印机印讲义，但蜡纸、油墨、纸张非常紧缺。当时蜡纸、油墨质量不太好，白天天热蜡纸容易溶化，他们就改在夜里印刷，并且印上几张就要朝蜡纸上吹吹冷风。

到了岸堤后，虽然生活、学习环境比较安定了，但办学给养无法保证，经济条件仍然十分困难。干校只能给学员提供最低的伙食和学习材料。宿舍里是清一色的地铺，薄薄的铺草上面铺一张席子，学员每人一床薄被，有的还要两人合盖。天气实在太冷了，总务处才发给一些烤火用的木柴。夏天没有蚊帐，蚊虫肆虐，同学们就到山上割艾蒿，拧成绳索晒干，点燃起来驱赶蚊虫。晚上，以班为单位围坐在一盏豆油灯下学习讨论，灯油也常常短缺。吃饭是靠募捐些地瓜干或带皮的高粱煎饼，有时募集不到饭食，学员就只能饿肚子。校门

前的汶河是学员们的洗浴盆，在滴水成冰的寒冬季节，学员们砸开冰块洗脸、洗衣服。尽管学习条件简陋、生活艰苦，学员们都没有叫苦，没有退却。

活泼向上的校风

岸堤干校是延安抗大式的学校，秉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校始终处于积极活泼、昂扬向上的氛围之中。

干校设有救亡室，组织学员开展体育、文化、娱乐等各种课外活动。救亡室设有墙报组，墙报内容由学员创作，内容结合时事，形式生动活泼，有政论散文、快板诗歌、漫画等等。各队还有娱乐组，经常编演各种文艺节目，学唱抗日歌曲。当时，在干校唱革命歌曲蔚然成风，整个校园歌声嘹亮，生机勃勃。唱歌还是组织动员群众的手段。1938年9月，干校为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组织民运队到岸堤集上演唱《流亡三部曲》，歌词句句扣人心弦，赶集的老百姓抑制着悲愤的情绪，全场鸦雀无声。突然，人群里迸发出“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群情振奋，当场就有数人要求参加八路军报国杀敌。

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要举办一次文娱晚会。此时各队救亡室的娱乐组得以大展身手，纷纷带着精心准备的节目登台亮相，有话剧、歌剧、快板、京剧、乐器演奏等。更有人擅长当啦啦队，使得会场气氛非常活跃，歌声一阵接一阵飘向远方，团结奋斗的氛围在校园里越来越浓厚。

投身反“扫荡”斗争

1939年5月下旬，日军飞机经常飞临岸堤上空进行轮番轰炸。山东分局发来指示，要求干校留下来，以岸堤为中心，就地坚持反“扫荡”。全校干部、学员编为二、四两个大队，进入边学习边反“扫荡”阶段。

很快，二大队与日军有了第一次“交火”。一天，二大队大队长崔兰亭率领小分队埋伏在汶河南岸。此时，日军在对岸向东推进，双方隔河相距不过三四百米。武装小分队瞄准日军打了几个排枪，三四个日军倒下了。对岸的日军大喊大叫，集中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向汶河南岸疯狂射击。眨眼间，一片片的高粱被机枪削断了，炮弹在学员们身后的高粱地爆炸，把一人多高的高粱和泥土掀起五六米高，学员们都变成了土人。日本兵炮火虽然猛烈，但此次进攻不久就撤走了，所幸学员无甚伤亡。

为有利于反“扫荡”，干校决定进一步精简人员，将部队缩编为两个中队。在反“扫荡”的40多天里，两个中队在南墙峪、岸堤一带隐蔽活动，与各区、乡武装紧密结合，协同作战，打击了日伪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民兵组织，壮大地方武装，组织乡村政权，促进了抗日根据地建设。

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举办5期培训班，培养党政、军、民干部3000余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干部学员中很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干校第二期学员，来自日照的范干民1938年底结业后，返回家乡开展抗日工作。1941年3月2日晚，范干民同50多人在黄墩村开会，敌人突然袭击，包围逮捕了与会人员，并用铁丝拴住范干民的脖子。为防其越狱，还在范干民的小腿上楔入铁钉，对他进行百般折磨。范干民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年8月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济南商会会长辛葭舟率领三个子女投身抗日洪流，大女儿辛锐、小女儿辛颖、儿子辛曙明都是第二期干校学员。其中，辛锐多才多艺，1941年3月担任山东省妇救会姊妹剧团团长，并与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结为夫妻。同年11月底，辛锐、陈明在大青山突围战中双双英勇牺牲。辛曙明在第二期培训班结业后，先后任南沂蒙县青救会干事、县委青委书记等职，1942年农历十月初五，在莱芜县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加强干部培训工作，1939年8月下旬，岸堤干校改建为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1940年3月，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并入抗大一分校。

（作者分别系山东省党史研究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山东省方志馆编辑）

父亲叫出来开导说，孩子出去干不好还能回来种地，在家里干不好你叫他去哪儿？感谢大伯一句话定了乾坤，让我迈出了走出农村的第一步。

在乡里工作的那段时间，我虽然年龄最小，但责任一点也不少，和老同志一样包村，组织并参加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夏收夏征，接触到很多新东西。社会的发展蒸蒸日上，我感觉到到处都是新闻素材，又在省市县新闻单位发了一些稿子。一年以后，县直属单位的领导把我要去写材料。几年间，我写的稿子陆续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半月谈》《瞭望》等中央主流媒体发表，有的还作为重要稿件配有评论，有的还在新华社发了通稿。实事求是地说，最初写的那几篇小稿改变了我的人生，决定了我的命运。

感谢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改革开放春风。40年弹指一挥间，岁月一去不复返，尽管今天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但那些曾经的记忆和情愫却永远留在了心底，成为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印记。



人生转折处

□ 朱世纯

古语云“春眠不觉晓”，可我这几天却辗转反侧，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去的岁月，在脑海里浮现最多的就是40年前的往事。

40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时我生活在农村，刚二十出头，充满梦想和干劲。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也就是我高中毕业那年，大队和生产队都开会传达文件，推行联产承包，老百姓说是单干。很快，原来属于集体的所有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农民最看重的土地和大牲口，以及道路两边高大的树木，都分到了家家户户，我家分到了8亩责任田。由于父亲在县城工作，很少回家，我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开始了与扬场放碌、犁耩锄耙打交道的日子。家里还搞起多种经营，饲养了500多只母鸡，种了一亩多蔬菜，房后有一亩沟藕，我整天起早贪黑干活，希望家里早日成为万元户，过上吃有嚼有钱花的日子。

就在我一门心思发家致富时，我

上初中时的班主任段老师，改变了我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1984年春节刚过，乡里成立业余通讯组，要求每个村指定一个人负责新闻报道，已经担任村主任的段老师记得我这个曾经的学生作文写得好，就把我的名字报上了。真是非常感激老师的信任和厚爱，让我有了接触新闻写作的机会。

从春天开始，乡里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例会，通报发稿情况。听到好几个村已经在县里的广播站发了稿子，有的还上了市里的报纸和电台，我感到非常着急，却又无从下手。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村支书给我提供了一个好素材。那年三夏时节，六组的一户农民和媳妇去乡粮所交公粮，工作人员一时马虎多付了300多元，被他们当即退掉了。要知道300元在当时可是个很大的数目，乡里干部的工资每月才几十元。我听了也深受感动，觉得邻居太了不起了，就按照在书上学过的记叙文的方法，写了

一篇小通讯《小两口退款风格高》，寄出没几天，就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农民之友》节目播出。

能从收音机里听到自己写的稿子，我欣喜若狂，也有了写稿的胆子和信心。两个月后的一天，秋雨渐沥，我去邻居家串门，看到墙上糊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介绍某地发展农村运输业的文章，就仔细看了起来。想到村上也有不少人赶着毛驴车在火车站搞运输，并且收入都不低，是不是也能写个稿子呢？回到家就动手写了一条消息，寄出不到一星期，《河南农民报》就以《火车站旁毛驴车队》为题在一版发表。

因为在省级媒体发了稿，有了点影响，引起乡里领导的注意。过了没几天，乡党委书记来到我家，通知我到乡里当“临时干部”。一向耿直的父亲怕我水平不行难以胜任，就直接拒绝说：“他那两下子干不了！”正赶上在外闯荡多年的大伯回乡探亲，他把



中国传统节日的设置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有文化的内涵和用意蕴含其中。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征，抓住其“以文化人”的本质，引导人们在欢度节日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伦理道德教育，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传统节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古人认为，“人无论外之人”。人必须处理好五种基本的伦理关系（“五伦”），即父子、夫妇、长幼、君臣（上级和下级）、朋友关系，才能达致个人幸福美满，社会和谐安定。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强调以此来保障人们过上童年积福、中年造福、老年享福的人生。古人对伦理道德教育极为重视，利用并创造一切机会进行教育，包括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熏陶和影响，如古人常常立下座右铭、墓志铭等，其内容常常起到勉励进步和警示后人等积极作用。在商汤王用于盥洗的盘上也刻有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便每天洗脸之时提醒自己日新其德。这说明古人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对人进行教育，以提升人的道德修养，进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传统节日设置的主要目的也就在于此——加强道德教育、和谐人伦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抓住节日“以文化人”的文化本质。在古代，“文化”一词由两个字组成：“文”，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像站立的人形状，文的本义为文身。《说文解字》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后来，“文”泛指符号，引申为文字，并进而有了文章、礼乐等释义。“化”的甲骨文和金文像两个人形，一个正立，一个倒立，会意变化颠倒之意。可见，“化”的本意为变化。《说文解字》解释：“化，教行也”，是“化”的引申义，意为人受教而变化。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化人”，以文学、文艺、建筑、雕塑，包括节日，对人进行教化，使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崇善向善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伦理道德教化是古人设置节日的重要目的。以清明节为例，清明时节扫墓，缅怀过世的父母祖先，其中蕴涵的“以文化人”教育意义非常显著。《论语》中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民风淳厚、人心厚道是结果，根源在于重视丧祭之礼，提倡知恩报恩、饮水思源、不忘本的孝道教育。因为人只有培养起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行为方式，才能减少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现象，从而使社会风俗变得淳朴厚道。

一般而言，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胜于言教。父母在世时，一个人通过孝敬父母的行为就可以潜移默化让孩子学到孝敬。但是如果父母过世了，又如何以身教教导儿女孝顺恭敬呢？在清明节带领儿孙参加祭祀祖先和过世父母的活动便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所以《礼记·祭统》云：“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也！”君子的教化必须从根本教起。同时，上辈人能够追念祖先和父母，晚辈就会从他们身上学到知恩报恩并因袭下去。因此，在中国古代，皇帝对于祭祖非常重视，并且设置隆重的祭祀。

清明追念父母、缅怀祖先还体现为古人要依时依礼进行祭祀的风俗，清明和冬至进行的祭祖礼仪最为隆重。清明节除了举办祭祖礼仪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昭述祖德，以此传承家风、家道、家文化。古时庶人（平民）虽没有庙，但是家家户户设有祠堂供奉祖先的牌位。每到清明祭祖时，全家族的人被召集在祠堂之中，听讲祖先的德行。例如，在明朝、哪代，家族中出现哪位有德行的先人，对国家、民众有何贡献。那么，作为后代子孙，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 刘余莉 申静思



小心谨慎，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行给祖先抹黑，令祖先蒙羞。东汉太守杨震有不收“四知财”的德操，教育杨家子孙秉持他的廉洁作风，以致杨家后代出现了“四世三公”的盛况。可见，中国古代的廉洁教育，早在家庭之中就已经开始了。这样，清明祭祀成为道德教育的机会场合，引发了人们对祖先功德的恭敬之心、思慕之心，培养了对家族的责任感和传承家风的使命感。

古代先贤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以及社会人伦之道来教化民众，强调无论是通过文字、文章、礼乐、节日，还是其他文化活动或形式，都以传承和弘扬“道”为旨归，以实现“化人”为目的。在这些文化的传承和教育中，形成了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理解本质，创新形式。孔子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的表现形式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损有益，但是礼“毋不敬”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同理，在推动传统节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庆祝活动的形式可以与时俱进、丰富多样，但传统节日以“道”为体，以“化人”为用的主旨不能改变，不能忽视其重视人伦亲情、崇尚道德的重要内容。同时，还需要以现代人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来继承传统节日和礼仪的文化内涵。

总之，要传承好中国传统节日，需要深刻认识古人设置传统节日“以文化人”的文化本质，认识其中渗透和承担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避免简单地对传统节日进行批判否定或盲目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对中国传统节日日进行传承和创新，助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